

》坐北朝南

五角场

程小莹

我曾经迷恋五角场。就像过去“国民政府”也曾经迷恋五角场一样——五角场被作为“大上海”的发展计划之一,但是后来一直打仗,和日本人打,还打内战,一直也没得空真正付诸建设。相关资料显示,上世纪三十年代“大上海计划”,其中四平路、邯郸路、淞沪路、翔殷路、黄兴路五条交通干道相交而筑,就已经俗称“五角场”了。

现在上海体院,也就是当年的“市政府”里,还保留着当时的“大上海计划”地图,不晓得真的假的。可以这样说,五角场从诞生之初便时刻做好了要成为“中心”的准备。那时候拟定了开发江湾、建设“大上海”的规划,并且由美国规划专家和中国设计师一起设计了“五角场”的构成:用三条马路——黄兴路、其美路(今四平路)和翔殷西路(今邯郸路)分别接通杨浦、虹口和闸北;用两条马路:翔殷路、淞沪路通向“大上海”腹地——江湾地区的东部;五条放射主道之间,各有横向的马路加以联结,如同蜘蛛网一样,结成密度平均的“棋盘状”道路网络。根据当时的设想,五角场将成为经济之都。

五角场的五条路,即四平路、黄兴路、翔殷路、淞沪路、邯郸路。邯郸路连接虹口,翔殷路连接军工路和中原小区,淞沪路连接宝山方向,五条路里只有四平路是直接通外滩市区的。四平路的定位,一直都是交通干道,我早年生活在四平路,就知道每天上下班高峰的55路公交车的拥挤。黄兴路是后起之秀,繁华段至大润发一带。我甚至觉得,五角场真正的闹猛,是在黄兴路这一带。黄兴路关山路口,往北面就可以看见五角场彩蛋。看看近处的少云中学,每天早上升旗奏国歌,会联想到

一句摇滚“红旗下的蛋”。

我在五角场,就这样保留着一些古怪而又神圣的记忆。还有那些路名,几乎都是以“国”和“政”开头的,也算是“国民政府”留下的遗产。

儿时到五角场去,是很严肃的事情,因为可以看见五角场有部队,海陆空三军都全了,有军用机场。所以一直有规定,不能建高楼。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五角场的发展。在我印象里,老早五角场最高的建筑就是朝阳百货了,现在万达广场的原址。

五角场于杨浦,是一个别致。杨树浦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场所,那五角场就是一个工人与军队集结待命的地方,一个大学和学生的汇集地。

空四军营管、空军政治学院、长海医院、二军大、华东军区后勤保障仓库……

复旦大学、同济大学、财经大学、外语学院……

五角场的人流里,也是这样的城市生活主流,工人和农民、军人、大学老师、校工、学生。他们从五条马路汇聚在一个场里,早年,五角场以北还是属于宝山区的。那时候,杨浦的商业中心是以控江路沿线和平凉路杨浦百货一带为主,而五角场,就是由店铺、书店、旧书摊、公交车终点站……组合而成,甚至索性以小摊、大排档著名。那种繁荣属于上世纪80年代后的五角场的——全上海最兴旺的地摊汇集地,可以五角场的五个街头转角为中心,扩散至方圆2至3公里。那时候,我在地摊上第一次看到喇叭裤,看到“日本进口服装”——其实是外国旧货。

1990年代后期,我就居住在五角场的国权路政本路口。我晓得五角场,并深入其间。

》水在瓶

生活规律的咪咪噜

孔明珠

咪咪噜不久就要2岁了,看起来身体不再长大也不再长胖就这样成型了。咪咪噜是头雌猫,虽然被人类镇压了她的性发育,没有机会发情没有机会生育,可她的样子还是雌性的猫,小小的脑袋,温柔的眼神,腰有些长却柔软妖娆。

咪咪噜属于和人不是很亲的那种猫,她喜欢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喜欢被抱。硬要抱她在怀中,她的动作比较僵硬,像一个被迫亲近的女孩,尾巴不停地甩动,仿佛在问,好了吗,好了吗?

咪咪噜是喜欢我的,只是她很有分寸,生活极其有规律,她有主见,不希望被打乱节奏。以前不知道猫咪睡觉的时间那么长,咪咪噜小时候玩的时间挺多的,成熟以后,睡觉的时间愈发长,白天可以整整一上午加一下午躲在哪里睡觉,家里没有动静的话,她不出来,不吃不喝不尿,真奇怪。

我的书桌上贴着一张纸条,是卡佛的语录:“一个作家要有面对一些简单的事物,比如落日或一只旧鞋子,而惊讶得张口结舌的资质。”这样说来,咪咪噜是有这样的资质的。傍晚时分,她睡醒之后跑到西面窗前,久久地眺望落日,四脚并拢,端端正正。我凑过去问她,咪咪噜呀,你看什么呀?咪咪噜温柔地回答我一声,继续眨眨眼眨眼睛眺望不知名的风景,偶尔打一个哈欠,突然耳朵一抖,原来一只小鸟飞过。

和我互动的游戏也是由咪咪噜规定时间的。我吃早点时间有点长了,因为看冬奥会,因为看财经新闻,咪咪噜不高兴了,她跑到我跟前,仰头叫,做早操啦,时

间过啦。我不理她,她不厌其烦,不达目的不罢休。唉唉唉,只得起身,放下咖啡杯,咪咪噜高兴得一路小跑,率领我去她的体锻地毯,翻个肚皮,四肢绷直,预备,起。

互动游戏一天起码两场,另一场被咪咪噜安排在我的晚饭后。所以我被管理得很严密,就像老师上课不能拖堂一样,我吃饭时间不能拖长,限时限量。咪咪噜那么可爱地仰头看着你,请求你,虽然有时叫声频率太高,我还是不忍心一再驳回。

咪咪噜喜欢玩跳高游戏,跳高是随着我的彩色飘带指挥棒左右回环高跳,我越是惊叫,她跳得越高,动作类似“动物世界”里看到的野生豹猫,当然强度不能比啦,我们是温室里面的花朵嘛。人还是比不过猫,当我累得气喘吁吁后,发明坐下来,把指挥棒一会甩到沙发背上,一会儿甩地下,让她折腾。咪咪噜每次蓄势待发的时候,总是低下身体,将两只前脚不断调整,屁股不断摆动,弄到最佳姿势,然后一跃而起。可是我这个坏人,就在地即将触到棒的时候跳开,回到地面,害咪咪噜不断下蹲下跳,气得呼呼喘气。那么,你既然知道妈妈这么坏,你就潦草点啦,可不,咪咪噜每次还要做同样的动作,一丝不苟,这位缺心眼的运动员不就是冬奥会上拿到金牌的女孩子一贯的训练风格吗。

总算的,大家都累了。咪咪噜如释重负,回到大橱顶上睡觉,她一格一格地循博古架上去,来到专床,歪下半边身体躺下,梳理一番,背朝着我睡了。如果这时你再喊她,是喊不动的,咪咪噜只会动动耳朵,表示她听到了,她才不愿像你一样任性妄为。

》禅风行笔

夏日里的乡野行

王琪森



粉墙乌瓦,竹篱相围。前是一湾清碧的池塘,柳叶拂水,荷叶田田;后是一片茂盛的竹林,枝叶婆娑,绿荫袭人,一派秀美的田园风光。乡下大阿姨的大儿子小龙虽比我大两岁,但这个乡间少年却比我要成熟得多,能干不少农活,还会捕鱼抓蟹。于是,小龙就成了我乡间生活的最好伙伴,教了我不少“技术活”。如捉知了就是第一课,先是将一团面粉在池塘边反复搓洗成黏糊糊的面筋,然后贴在长长的竹竿梢上,这样就可以去粘知了(乡下叫“夜乌子”),粘知了要选在正中午,这时由于气温最高,正是知了叫得欢的时段,而且粘知了不能站在向阳处,要选背阴处,这样可以发现知了透明的翅膀在阳光下扇动。而且下手时要快、准、轻,太重了会折断知了的翅膀。经过半天的培训,第二天中午我就一下子粘了七八只知了,装在绿纱笼中,听着知了的鸣唱,我心里很是得意。

在我们这代人的暑期生活中,最充满乐趣的是到乡下玩耍。每年暑期过到一半的时候,我们这些小朋友的家长约定俗成似的都要送我们到乡下去过一个星期左右。说是让我们接触乡野之气,让皮肤晒晒黑,有利于强健筋骨、生长发育。

而我们却把这夏日里的乡野行,看作是自由自在的“放生”,可以暂时脱离父母的看管,在乡野林间,河畔池塘尽情地疯玩,反正那时还没有升学的压力和竞争的焦虑。阿毛头的老家是出“霉干菜”的绍兴,大块头的老家是出“咸黄鱼”的宁波,小四眼的老家是出“咸蛋”的高邮,我的老家是出“甜芦粟”的浦东北蔡。行前,我们会在我家客堂的学习小组会上互相告知,大概什么时候走,几号回来。并约定都要带些乡下土特产到学习小组上“共产”。阿毛头仗着自己长得高大,平时经常要欺负小四眼,但此时他却会像老大哥似的关照小四眼:“依游泳还没有学会,换气也不会换,千万不要下河浜游泳。”小四眼“嗯”了一声。临别,大家把小手勾在一起,齐声高喊:“一礼拜后,再会!”有些像壮士出行。

我至今清晰记得浦东北蔡的老宅,是

粉墙乌瓦,竹篱相围。前是一湾清碧的池塘,柳叶拂水,荷叶田田;后是一片茂盛的竹林,枝叶婆娑,绿荫袭人,一派秀美的田园风光。乡下大阿姨的大儿子小龙虽比我大两岁,但这个乡间少年却比我要成熟得多,能干不少农活,还会捕鱼抓蟹。于是,小龙就成了我乡间生活的最好伙伴,教了我不少“技术活”。如捉知了就是第一课,先是将一团面粉在池塘边反复搓洗成黏糊糊的面筋,然后贴在长长的竹竿梢上,这样就可以去粘知了(乡下叫“夜乌子”),粘知了要选在正中午,这时由于气温最高,正是知了叫得欢的时段,而且粘知了不能站在向阳处,要选背阴处,这样可以发现知了透明的翅膀在阳光下扇动。而且下手时要快、准、轻,太重了会折断知了的翅膀。经过半天的培训,第二天中午我就一下子粘了七八只知了,装在绿纱笼中,听着知了的鸣唱,我心里很是得意。

小龙教我的第二招是支匾捉麻雀。就是在老宅后的竹林中,用竹棍支起一只圆竹匾,地上撒些米粒,竹棍下用一根长长的棉纱线系着,我和小龙躲在远处,屏住呼吸,待几只麻雀飞下来吃来时,就迅速将竹棍拉倒,这样一下子可以捉到五、六只。但当我单独作战时,守了半天,一只麻雀也不飞下来,最多是围着竹匾飞几圈就逃之夭夭。当我向小龙请教时,小龙想都不想地说:“依站在上风处,麻雀很聪明的,它们一闻到人的气味自然就飞走了。”

》念念有词

最忆共青城

袁念琪

1985年9月,我两赴江西报道共青垦殖场建场三十周年。面积7.26平方公里的垦殖场位于鄱阳湖畔,从南昌过去有110公里。1955年,98个上海青年来到德安八里乡九仙岭的荒滩野岭。住的是茅棚,吃的是稀粥咸萝卜干黑泥豆。在他们垦荒的第39天,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耀邦在沪听说此事就赶来。用筷子夹棉袄写下他起名的“共青社”,希望垦荒队员建起一个小上海。回京后,还寄来篮球、胡琴喇叭等文体用品。

1978年,胡耀邦第二次为共青人题名“共青垦殖场”。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时隔二十九年后再来共青,第三次挥毫写下“共青城”。他提出:要注意改善职工的生活,工资争取年年都要有所增长。说几十年来我们许多干部在指导思想上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只想扩大生产而不关心职工收入的增加,把这两件本应互相促进的事情对立起来了。要把人民生活的改善作为刺激生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这样,单位和个人才有希望。

第一次去是做前期宣传。经过几天采访拍摄,回上海后播了专题片《拓荒者的道路》,向家乡人民介绍垦荒者走过的道路和共青今貌。二赴共青是随上海市慰问团。这次慰问与青年搭界,团里有时任团市委副书记的范希平、时任《青年报》老总的丁法章、紫江集团董事长沈雯、上海衬衫二厂厂长王炳均、我国首批自己培养的18位博士之一的王建磐、市政府信息中心主任的黄奇帆、著名体操运动员朱政等。

二进共青城,整个城是一片节日气氛。共青人按胡耀邦同志的建议,把庆祝

会改为“共青垦殖场建场三十周年回忆联欢活动”。还遵照他的建议,“把分散在各地的老垦荒队员和他们的子女请来,还要请萝北的垦荒队员,请那些去大陈岛、海南岛、新疆、西藏工作的青年代表,请朱伯儒、张海迪,请30多年来的青年英雄人物,请大学生代表。”

虽为“回忆联欢活动”,大家还是把它看作三十大庆。那晚,时任团中央书记的李源潮来看上海老乡,他带来胡耀邦写给建设者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今天,在我们党领导十亿人民进行改变自己命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仍然需要大力发扬你们这种极可宝贵的垦荒精神。一切有理想、有抱负、有出息的当代中国青年,都应该从你们的奋斗历程中悟出一个不朽的真理:中国青年的光明前途要靠自己去用双手去开辟,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要靠自己去用双手去开辟。”落款的日子是1985年10月15日。四年后的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去世。翌年4月15日,葬于共青城的富华山。

10月18日,联欢活动当天,我拿着录像带驱车奔南昌,到江西电视台传送上海,赶台里晚6:30的《新闻报道》。返回的路上,车抛锚在山里。司机钻在车底下,我在一旁打手电。十月的天,早就黑得墨一样了。远处,共青城那片是灯火辉煌。

回到共青,没赶上晚饭。食堂无人,但有包好的饺子。于是,自己动手烧水下饺子。礼堂里的文艺演出仍在进行,歌声笑声掌声不断传来。那天下午是参加全体合影,后来拿到的那个长卷照片里没我,但依然收藏着,直到今天。青春的日子,真好。